

研究論文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基於政務短視頻的有調節中介效應分析

謝澤杭、于晶

摘要

隨著互聯網技術不斷發展，政治傳播渠道更為多元，線上社交媒體，尤其是政務短視頻平台，逐漸成為制度化政治參與新路徑。為洞察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本研究基於強化螺旋模型，以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作為中介變量、政治效能感為調節變量，進行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研究發現，高政治效能感的新生代農民工，其政治認同在直接效應和中介效應下均可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產生正向影響，且中介效應的影響程度大於直接效應。對低政治效能感的新生代農民工而言，政治認同必須在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這一中介作用下方可正向影響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研究認

謝澤杭，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新聞與傳播系博士研究生。研究興趣：新媒體用戶行為與心理、政治傳播。電郵：541778332@qq.com

于晶，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新聞學系副教授。研究興趣：政治傳播、政務新媒體。電郵：jyu@dlps.ecnu.edu.cn

論文投稿日期：2022年11月2日。論文接受日期：2023年7月19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8期(2024)

為，政務短視頻是公權力對技術賦權邏輯的優化，即由政黨作背書，為新生代農民工構築穩定安全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平台。這一方面有利於消解資本邏輯下算法機制對新生代農民工的「信息繭房」等不良影響，儘可能實現更廣泛的參與，另一方面有助於維護穩定的輿論生態，防止短視頻算法邏輯下產生的「群體極化」現象。研究結果支持了強化螺旋模型，認為該模型很大程度上受到媒介本身屬性的影響，內容信息本身、媒介的互動機制難易程度，都會對強化螺旋模型的有效性產生影響。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政務短視頻、政治效能感

Research Article

Influence of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n Institutionalized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Mediation Effect Based on Short Videos of Government Affairs

Zehang XIE, Jing YU

Abstract

As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advanced, the channels fo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iverse. In addition, online social media, particularly short videos of government affairs, continue to emerge as new avenues for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o gain insights into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political identity on institutionalized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is study applied the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short videos of government affairs as the mediating variable and political efficacy as the moderating variable. A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was conducted based on the reinforcing spirals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d a strong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 and their political identity had positive direct and mediating

Zehang XIE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behavior and psychology of new media user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Jing YU (Associate De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new media of government affair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8 (2024)

effects on institutionalized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 was greater than the direct effect. The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ith weak political efficacy, political identity positively influenced institutionalized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short videos of government affair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short videos of government affairs platforms represent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logic of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by a public authority endorsed by a political party that constructs a stable and secure platform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o participate in institutionalized network politics. On one hand, it is helpful to eliminat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information cocoon house”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under capital logic and the algorithmic mechanism to achieve the widest possible particip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helps maintain a stable public opinion ecology and prevents “group polarization” under the logic of short video algorithms. Although the results support the reinforcing spirals model, they indicate that the model is affected by the attributes of the media. The content and the difficulty of interacting with media may influe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inforcement spiral model.

Keywords: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political identity, institutionalized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hort videos of government affairs, political efficacy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Xie, Z., & Yu, J. (2024). Influence of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n institutionalized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mediation effect based on short videos of government affair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8, 45–84.

致謝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基於立場分析的重大疫情網絡輿情引導策略效果評價研究」(21BXW096)階段性研究成果。

感謝匿名審稿專家的寶貴意見及編輯老師的辛苦付出，他們的幫助讓文章質量得以進一步提升。

引言

對政治認同的討論自古有之，古代中國既有「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重要命題，也有「人存政興，人亡政息」的政治經驗，實際上都在探討政治認同問題（桑玉成、梁海森，2017）。政治認同常與制度化政治參與一同出現，以往研究常將制度化政治參與作為自變量、政治認同作為因變量，以考察政治行為對態度的影響；也有研究從相反的視角出發，探索態度本身對行為的影響。政治認同是認同問題在政治領域的表現，是社會成員對其政治身分的明確以及對所在政治共同體心理上的認可和情感上的依附（徐家林、張茜，2020），是凝聚共識、形成有效制度化政治參與的重要保證，對於維護國家和社會穩定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高永久、楊龍文，2022）。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傳播系統趨於多樣化。政治傳播逐漸由傳統媒體轉向線上社交媒體，使得線上社交媒體成為制度化政治參與的新場域。短視頻平台作為社交媒體的一個重要分支，逐漸引起政府機構的關注。隨著政府機構紛紛入駐短視頻平台，政務短視頻已悄然成為新的制度化政治參與渠道。以往嚴肅的政務信息以更為生動的短視頻形式呈現，評論、直播互動等方式豐富了普通受眾制度化政治參與途徑。那麼，在互聯網飛速發展的當下，政治認同與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是否發生了變化？它們之間存在著怎樣的聯繫？這些都是以往研究尚未關注的議題。

政治參與是指公民直接/間接影響或試圖影響政府的行為（Verba et al., 1995）。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和納爾遜（Joan Nelson）（1989）認為，政治參與可以分為制度化參與和非制度化參與兩類：前者屬於常規政治的範疇，通常是一國政治制度下合法的常規性參與管道，後者則往往與社會運動、大眾反抗等概念聯繫在一起，代表合法或非法的政治抗爭或極端行動（寧晶、孟天廣，2019；王衡、季程遠，2017）。目前關於制度化與非制度化政治參與的界定眾說紛紜，但是否通過官方渠道開展政治參與是絕大多數學者所認可的區分方式（寧晶、孟天廣，2019；王衡、季程遠，2017）。因此，本研究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強調公民通過互聯網上的政府官方渠道，即政府網站、兩微一端（即微博、微信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8期(2024)

及新聞用戶端。微博類似於Twitter；微信則是一種即時通訊軟件，類似於WhatsApp；新聞用戶端是專門用於提供新聞的手機應用程序)及政務短視頻等，直接或間接影響政府決策的政治行為，如利用政務短視頻發表與政治議題有關的建議意見、發表政治熱點評論、維權等等。

許多研究探討了中國公民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如中國公民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法律規制面臨的困境與出路(王明生、馬維振，2020)；少數民族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主要因素、困局與路徑(劉娟、張國軍，2014)；中國公民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現狀及保障對策(楊福忠、姚鳳梅，2012)等。但弔詭的是，豐富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卻沒有同樣豐富的定量實證研究。已有的中國民眾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多為偏思辨的闡釋性研究，這導致研究結果可能因為主觀性而受到詬病。少數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定量研究多聚焦青年或大學生群體，因為相較老一輩而言，他們受到社交媒體和互聯網的影響更深(黃欣欣，2022)。相關研究發現包括社交媒體偶遇式新聞接觸對青少年潛在政治參與具有顯著正向作用(黃欣欣，2022)、信念型和利益型動機是民族地區大學生網絡政治參與行為的主要影響因素(張濤、楊麗，2019)等等，但尚未有研究聚焦同樣值得關注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

新生代農民工指「1980年及之後出生的、進城從事非農業生產六個月及以上的、常住地在城市，戶籍地在鄉村的勞動力」(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09；袁瀟，2019：11-13)。為何研究新生代農民工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是必要的？首先，非工非農的「第三種戶籍」的農民工群體已成為社會結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李強，2019)，其制度化政治參與應當得到更多關注。其次，與老一輩農民工不同，新生代農民工伴隨著互聯網一同成長，媒介在其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烙印。網絡提供多元的制度化政治參與渠道，社交媒體則通過刺激政治興趣，降低參與成本(Brundidge, 2010)、簡化參與方式(Willnat et al., 2013)，提高公眾在政治活動中的捲入度(張明新、黃欣欣，2022；Barry, 2001；Norris, 2001)。但現有研究卻忽略了在時代轉型中，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群體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僅有的相關研究停留在政務微博、微信剛剛興起，而政務短視頻尚未出現的2016年，且僅用描述性統計方法分析了新生代農民工對網絡問政的態度(蔣琳等，2016)。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

網絡渠道及短視頻的出現大大降低了政治參與難度。不同於政務微博、政務微信，政務短視頻自2018年誕生伊始，就極具自身特色——簡短、生動、權威且不乏趣味性，使政務新媒體一改往日嚴肅的形象。政務短視頻是黨政機構在短視頻平台上所開設、發布政務信息的賬號(馬亮，2019)，用戶無需閱讀冗長的文字，評論亦不需要經作者精選後才可發布，簡單易懂的流媒體形式和推送機制讓政務短視頻的傳播更為廣泛，參與互動的方式也更為便捷。通過政務短視頻的評論區、私信區或轉發到自己賬號並評論的方式，表達政治觀點、開展網絡維權，已經成為新生代農民工重要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形式。因此，政務短視頻作為新生代重要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形式，具有很強的研究代表性。

本研究將聚焦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群體，在關注其政治效能感個體差異的同時，以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作為中介變量，探尋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從而了解政務短視頻在這一群體中的傳播效果，並從個體特質和媒介影響雙視角解答如何調動新生代農民工參與政治生活積極性的問題。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基於強化螺旋模型(reinforcing spirals model)，本研究通過文獻回顧探討政治認同與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並將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作為中介變量、政治效能感作為調節變量，由此提出研究假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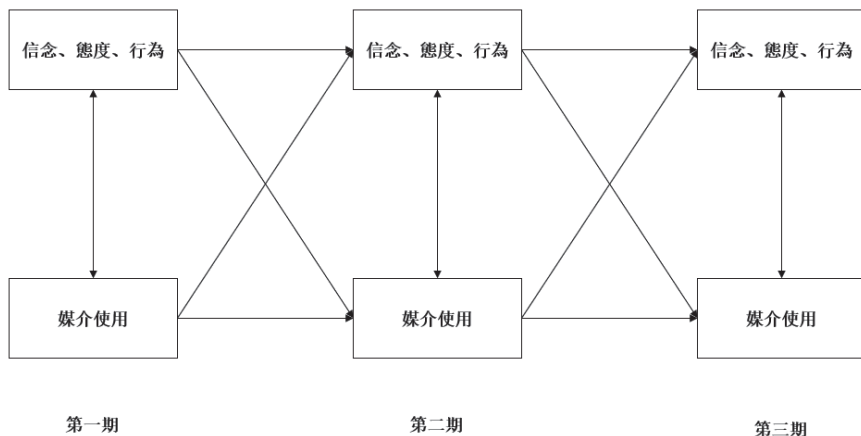
強化螺旋模型

強化螺旋模型最早由Slater(2007)提出，是一種描述人們行為、信念和態度如何與媒體使用相互影響並逐漸增強的理論框架。通過把媒介選擇和媒介效果這兩個因素結合在一起，強化螺旋模型將媒介使用建構為一個動態的、內生的過程(Slater, 2014)。如圖一所示，強化螺旋模型包含兩個基本假設(鍾智錦、廖小歐，2022)：一是，媒介使用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8期(2024)

既充當結果變量又充當預測變量，媒介使用既受社會語境和個體特徵(如態度、行為等)影響，反過來又會影響個體態度和行為(Slater & Rasinski, 2005)；二是，選擇性的媒介接觸和媒介接觸的效果構成了一個動態持續的過程，質言之，人們的個人信念、態度和行為會影響他們選擇和解讀媒體內容的方式，而他們通過媒體接觸到的信息反過來又會影響他們的信念、態度和行為。這就形成了一個反覆強化的循環，或者說螺旋(Slater, 2014)。

圖一 強化螺旋模型(Slater, 2007, p. 284)



對於新生代農民工而言，政務短視頻使用同樣可能存在強化螺旋模型所提出的假設，政治認同可能會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對政務短視頻的感知有用性，而政務短視頻的感知有用性又可能會進一步引發其信念、態度、行為的變化，產生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以此循環往復，促進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意識的提升。

政治認同與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

政治認同是個體對政治體系及其運作的認可，包含體制認同、政黨認同、身分認同、文化認同、政策認同、發展認同等多個維度(中國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

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2009；詹小美、王仕民，2013），這一認同情感直接影響了個體的政治行為和態度，從而影響政治穩定與發展（蘭君、張旭，2014）。如果缺乏政治認同，則可能會阻礙個體的制度化政治參與（Kim & Hyun, 2017）。對於新生代農民工而言，他們的政治認同更容易受到體制完善性、政黨歸屬感、社會階層分化、社會價值觀念變革、政策完善程度和人民利益需求滿足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李奮生等，2016）。

實證研究支持了政治認同與政治參與正相關的邏輯。例如，Fowler 和 Kam（2007）、Huddy（2003）的研究發現，公民對政治組織或團體的認同度越高，他們就越傾向於採取與該組織或團體相一致的行為。而 Weinschenk 等人（2021）的研究也證明，高度的政治認同感可以激發公民的主體意識，從而使他們更積極地參與政治話題討論。而在中國語境下，張意濃（2020）的研究發現，政治主體、規範、程序認同與制度化政治參與行為，如參與居委會投票、使用熱線等媒介評價政府等，彼此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相關性。

在新生代農民工中，政治認同與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可能同樣存在正向相關。新生代農民工較老一輩農民工而言，能更熟練使用社交媒體和其他線上平台，因此更可能採用社交媒體作為制度化政治參與渠道，例如發表政治觀點、參與政策討論，或是了解關於政府的信息。政治認同感有可能進一步驅動他們進行網絡政治參與。如前文所述，由於認同感可以促使個體與他們所認同的政治實體的行為保持一致，那麼新生代農民工在感受到更強烈的政治認同感時，可能更願意在網絡上表達與其認同的政黨或政策的支持，或是積極參與到網絡上的政策討論中。這種參與行為不僅是他們對政策、政黨或政府的支援的體現，也是他們對自己權利的行使，通過網絡平台參與到公共議題的討論中，他們能夠更好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和需求。因此，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認同可能會直接影響他們在網絡上的政治參與行為。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1：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與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顯著正向相關。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8期（2024）

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的中介作用

根據Davis等人（1989）的定義，感知有用性是指個體認為使用特定系統會增加其工作績效。達爾（Robert Dahl）和斯泰恩布里克納（Bruce Stinebrickner）（2012）在《現代政治分析》（*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中提出，政府發起的政治活動有用性是需要從是否實現個體和集體兩方面利益來考察。由政務短視頻的政府主體性可知，運營政務短視頻可以被視為一種由政府發起的政治活動，其感知有用性同樣可以從是否實現個體和集體兩方面利益進行考察。在個體利益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可能會評估政務短視頻是否提供了他們所需並對自身權益有益的信息，比如，就業信息、勞動權益保護的相關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對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產生積極影響的信息。在集體利益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可能會關注政務短視頻是否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監督公權力，以及有效反映和解決他們這個特定社會群體的共同問題和關切。

對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中介作用的研究需從兩個角度切入。首先，政治認同影響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由強化螺旋模型可知，個人自身的信念態度會引起其媒介使用的感知，如對某一政黨有強烈認同感的觀眾，更傾向於選擇支持這一政黨的電視節目，因為他們會認為這對於自身獲取信息是更有用的（Bou-Hamad & Yehya, 2016）。Stroud（2010）將其定義為黨派選擇性曝光（*partisan selective exposure*），指人們往往很容易更願意相信，他們所支持的政黨的媒體會有更強的有用性。以上實證證據證明了政治認同與媒介使用感知有用性之間的關係；具體到本研究中，感知有用性是個體系統使用心理的重要考察維度，對於政務短視頻而言，由於其特殊的政務屬性，一經出現便被貼上「官方標籤」，受眾很自然將其與黨和政府掛鉤，因而受眾對政務短視頻的感知便很容易受其對政治體制的感知所影響。有較高認同度的新生代農民工，往往認可有官方屬性的政務短視頻，更願意在政務短視頻上搜集與經濟、制度等方面利益訴求相關的有效信息。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很可能也存在該效應，即更高政治認同的農民工有更高的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

其次，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影響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這一問題實際上關注的是傳播效果，即強化螺旋模型所指出的媒介使用對個體態度和行為的影響。受眾維度的傳播效果研究一直以來都沿用心理學中的從認知、態度到行為這一路徑來判斷媒體信息對於受眾的影響，而網絡信息傳播效果「認知－情感－行為」階梯模式理論亦已得到廣泛運用（羅瑩、劉冰，2009）。政務短視頻的感知有用性和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是一個從認知到行為的遞進過程。李占樂和魏楠（2020）通過對62篇實證研究文章進行元分析，發現受眾對網絡政治參與平台的感知有用性（包括滿足他們獲取政務信息和參與政治活動的個人需求，以及對社會公正和公共利益的貢獻），與中國公民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顯著正向相關。于晶、謝澤杭（2020）綜合利用德爾菲法（Delphi method）、灰色統計法和層次分析法構建政務短視頻傳播效果評價指標體系，認為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對受眾對政務信息的轉發、評論等維度上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行為有重要影響。政務短視頻作為新的網絡政治參與平台，是新生代農民工通過官方渠道開展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新途徑。新生代農民工觀看政務短視頻時，他們的感知有用性不僅來自信息本身的質量和相關性，也包括該信息如何滿足他們的個體和集體利益。在個體層面，政務短視頻通過提供與他們生活、工作緊密相關的信息，滿足他們在社會、經濟方面的具體需求。例如，政務短視頻提供的法律、政策信息，可以幫助他們更好地維護自身權益，獲取生活服務等。在集體層面，政務短視頻通過發布公共政策、社區活動、農民工權益等信息，有助於新生代農民工更好地理解 and 參與集體活動，進一步增強他們的集體認同感和社區歸屬感。例如，關於農民工權益保護的政務短視頻，可能會引起新生代農民工的共鳴，促使他們更積極地參與到保護農民工權益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活動中去。對於認為政務短視頻有用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更可能在網絡上參與政治討論、發表自己的觀點，甚至參與政治決策。他們可能會通過轉發、評論政務短視頻來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和訴求，從而成為網絡政治生態的積極參與者。因此，對新生代農民工來說，政務短視頻的感知有用性不僅是技術或信息傳遞效率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些視頻能夠如何滿足他們的個體和集體利益需求，以及如何促使他們更積極地參與網絡政治活動。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8期(2024)

綜上所述，政治認同可能影響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亦可能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2：新生代農民工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在政治認同和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之間起中介作用。

政治效能感的調節作用

Campbell等(1954)最早給出了政治效能感的經典定義：個人對自己影響政治和社會方面能力的感知與評價。Lane(1959)進一步將政治效能感分為內部政治效能感(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與外部政治效能感(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前者為公民對自己理解政治或參與政治活動能力強弱的感知，後者則強調個體對現存政治系統的評價。不同個體的政治效能感存在較大差異，它作為公民對自身政治活動能力感知的重要屬性和衡量個人對政治系統回應性的關鍵維度，很大程度上會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因此，在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研究中，對政治效能感的考量是必不可少的。

已有對中國公民選舉參與的研究(鄭建君, 2019)證明了政治效能感對制度化政治參與的正向影響。Chan等(2016)探求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三地學生移動社交媒體對其政治參與影響時，將政治效能感作為中介變量，證明政治效能感在社交媒體使用與線上線下政治參與關係中的中介作用。除了將政治效能感作為自變量或中介變量使用外，近年來國外諸多研究也將其作為調節變量來考察，如Nah和Yamamoto(2020)在研究公民記者(citizen journalism)、政治討論(political discussion)和公眾參與(civic participation)三者關係時，引入政治效能感這一概念，發現政治效能感較高的人，政治討論與公民參與之間的正相關關係更強，從而證實政治效能感對政治參與具有調節作用。

對於新生代農民工來說，政治效能感的調節作用不僅可能發生在政治認同與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直接效應中，亦可能存在於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影響的中介效應下。網絡政治參與作為一種新型的政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

治參與方式，其特性和制度化政治參與有所不同。網絡政治參與的門檻更低，公民可以通過評論、轉發、點讚等簡單的操作參與政治討論和行動，這使得網絡政治參與對政治效能感的要求不如制度化政治參與那麼高。但是，政治效能感仍然在網絡政治參與中起到關鍵作用。首先，政治效能感高的個體更可能認為自己能夠理解並影響政治，這使他們更有動力在網絡上參與政治討論和行動。其次，政治效能感高的個體對現有政治系統的評價更高，他們更可能認為網絡政治參與是一種有效的政治參與方式，從而更積極地參與。

此外，政治效能感也可能調節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和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關係。政治效能感高的新生代農民工可能更容易認識到政務短視頻的有用性，因為他們更可能認為這些視頻提供了有價值的政治信息，並能通過網絡進行制度化政治參與。這可能使他們更積極地進行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從而加強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和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關係。反之，政治效能感低的新生代農民工可能更難認識到政務短視頻的有用性，這可能使他們在網絡上的政治參與程度較低，從而削弱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和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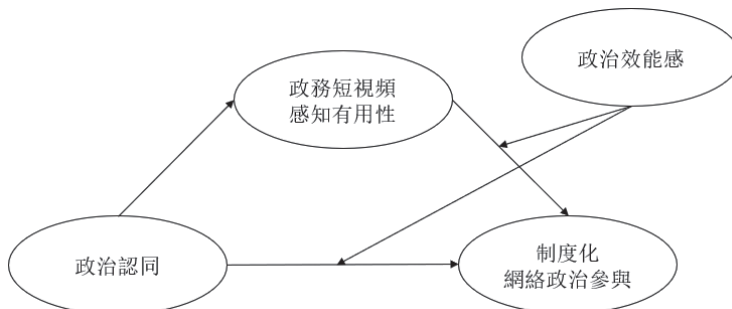
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3a：新生代農民工政治效能感在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直接影響中起調節作用。

H3b：新生代農民工政治效能感在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和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關係中起調節作用。

最後，基於上述四個研究假設，構建如圖二所示研究假設模型。

圖二 研究假設模型



研究設計

本研究在已有成熟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德爾菲法設計調查問卷，建構研究模型，採用滾雪球方式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發放問卷，進行資料獲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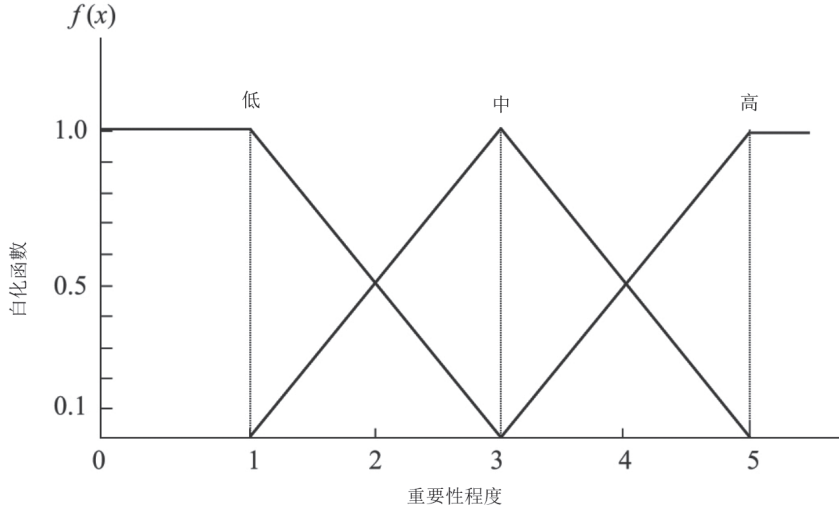
問卷設計與模型建構

研究通過調查問卷形式獲取資料。基於上述研究基礎，設計包含4個核心變量、11個測度項和43個具體題項的初始問卷。為保證問卷內容效度，研究測度項及題項均改編自現有較為成熟且認可度較高的研究。但由於現有的成熟量表中，一些問項很可能不大適合出現在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問卷中，或需對提問內容作較大調整。為進一步保證內容效度，本研究邀請覆蓋高校、科研院所、黨政機構在內的25位政治傳播領域專家，運用德爾菲法再次優化問卷。具體操作如下：首先，我們邀請五位專家審閱問卷核心變量、測度項和具體題項，對初始問卷進行修改，確保具體題項能反映所屬測度項，測度項能反映所屬核心變量，同時保證提問合理、有效。專家審閱後，文章刪去了多位專家認為不適宜向新生代農民工提問的「政治認同」量表中涉及特殊歷史事件及「政治運動」的四個問題。經刪去、調整後，本研究得到包含4個核心變量、11個測度項和39個具體題項的問卷x1。接著，我們邀請所有25位專家對問卷x1具體題項重要性打分，重要性程度採用李克特五級量表，1至5分別表示「非常不重要」、「不重要」、「一般」、「重要」、「非常重要」。問卷最後附有「需要補充的指標」。

本研究通過構建灰類白化函數，歸納統計初始題項重要性程度所屬灰類，加強對問卷題項重要性程度的認知。本研究將統計灰類依次分為低、中、高三個等級，構建具體題項重要性程度的白化函數，如圖三所示。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

圖三 具體題項重要性程度的白化函數



設 $f_k(ij)$ 為第 j 項指標的重要性程度為 i 的白化函數值， K 指灰類數（等級數），即 $K = 1、2、3$ ； d_{ij} 指第 j 項指標的重要性程度的分值为 i ； $j = 1、2、\dots、39$ ， $i = 1、2、3、4、5$ 。

當 $K = 1$ 時，灰類等級「低」，初始題項重要性程度的白化函數 $f_1(ij)$ 為：

$$f_1(ij) = \begin{cases} 0, & d_{ij} \geq 3 \\ \frac{3-d_{ij}}{3-1}, & 1 < d_{ij} < 3 \\ 1, & d_{ij} \leq 1 \end{cases} \dots\dots\dots \text{公式 (1)}$$

當 $K = 2$ 時，灰類等級「中」，初始題項重要性程度的白化函數 $f_2(ij)$ 為：

$$f_2(ij) = \begin{cases} 1, & d_{ij} < 1 \\ \frac{d_{ij}-1}{3-1}, & 1 < d_{ij} < 3 \\ 1, & d_{ij} = 3 \\ \frac{5-d_{ij}}{5-3}, & 3 < d_{ij} < 5 \\ 0, & d_{ij} > 5 \end{cases} \dots\dots\dots \text{公式 (2)}$$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8期(2024)

當 $K = 3$ 時，灰類等級「高」，初始題項重要性程度的白化函數 $f_3(ij)$ 為：

$$f_3(ij) = \begin{cases} 1, & d_{ij} \geq 5 \\ \frac{d_{ij}-3}{5-3}, & 3 < d_{ij} < 5 \\ 0, & d_{ij} \leq 3 \end{cases} \dots\dots\dots \text{公式 (3)}$$

設第 j 項指標屬於第 K 個灰類的決策係數 (即灰色統計數) 為 $\eta_K(j)$ ，評價第 j 項指標重要性程度為 i 的專家數量為 $n(ij)$ ，第 j 項指標重要性程度為 i 的白化函數值為 $f_K(ij)$ ，則：

$$\eta_K(j) = \sum n(ij)f_K(ij) \dots\dots\dots \text{公式 (4)}$$

我們將 25 份的專家打分整理後，運用公式 (1)、公式 (2)、公式 (3) 對調查對象關於各項初始題項重要程度的分值進行計算，通過公式 (4) 最終得出 39 項初始題項重要性程度的灰類決策係數，並得到各項初始題項重要性程度的灰色決策向量 $\{\eta_{低}, \eta_{中}, \eta_{高}\}$ ，以此判斷各項初始題項重要性程度。

本研究運用灰色統計法進行指標的篩選，將重要性程度較弱的初始題項剔除 (如「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的「集體利益」維度刪去了「政務短視頻有利於維護基層民主」〔政務短視頻還未深入基層〕；「個體利益」維度刪去了「政務短視頻所發布的信息能讓我感到放鬆」〔與主題關聯度較低〕等)。根據調查對象回饋意見，我們適當增補個別具體題項，再次調整部分題項表述。本研究最終確定了如表一所示包含 4 個核心變量、11 個測度項和 35 個具體題項的問卷。問卷還涵蓋性別、年齡、民族、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職業類型等人口統計學變量。問卷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方式設問，1 至 5 分別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確定」、「同意」、「非常同意」。其中部分問項採用反向賦分方式。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

表一 核心變量測度項、題項及來源

| 變量 | 測度項 | 題項 | 來源 |
|---|-------------------|------------------------------------|--|
| 政治認同 (PI) Cronbach's α = .80 | 體制認同 (IN) |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有力推動了中國發展。 | 房寧等，2013 |
| | | 中國當前需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 |
| | 政黨認同 (PP) |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充分體現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 | |
| | | 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對中國的發展極為重要。 | |
| | | 中國的政治協商制度和多黨合作制度，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極為重要。 | |
| | 身分認同 (ID) | 採用多黨競爭制度更有利於中國發展。 | |
| | | 作為中國人，我很自豪。 | |
| | 文化認同 (CU) | 在國外被誤認為日本人或韓國人時，會鄭重地說明自己是中國人。 | |
| | | 公民的身分對個人來說是無所謂的。 | |
| | 政策認同 (PO) | 個人的民族身分不應該被忽視。 | |
| 中國傳統文化對我個人具有很大影響。 | | | |
| 我認同黨和政府強調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 | | |
| 黨和政府的政策，比較符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實際。 | | | |
|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曾有政策存在決策失誤。 | | | |
| 發展認同 (DE) | 中央的重大決策能夠在全國全面執行。 | | |
| | 改革開放是中國發展的正確選擇。 | | |
| 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 (PU) Cronbach's α =.85 | 個人利益 (PE) | 國家的發展與我關係不大。 | |
| | | 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經找到了適合本國發展的道路。 | |
| | 集體利益 (GR) | 政務短視頻讓我獲得有用的政務內容和信息。 | |
| | | 政務短視頻有助於我政治素養的提升。 | |
| | | 政務短視頻能滿足我在政務領域的特定需求。 | Davis et.al., 1989; 達爾、斯泰恩布里 克納，2012；謝澤 杭、于晶，2020 |
| | | 政務短視頻有助於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 |
| | | 政務短視頻有利於監督公權力運行。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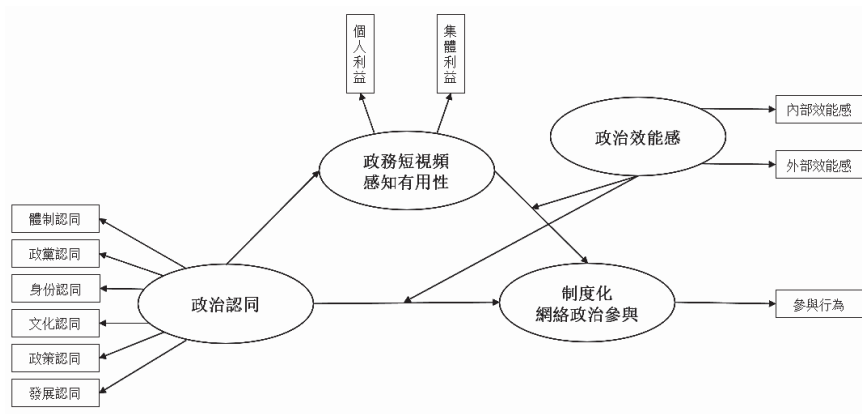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8期(2024)

| 變量 | 測度項 | 題項 | 來源 |
|--|------------|--------------------------------|---|
| 政治效能感 (PE) Cronbach's α =.83 | 內部效能感 (IE) | 像我這樣的農民工也可以影響到政府決策。 | Niemi et al.,1991; John & Michael, 2010; 史為民等, 2012; 張濤、楊麗, 2019 |
| | | 和周圍人相比,我有能力通過網絡把信息傳播給更多人。 | |
| | | 有時候政治上的事情很複雜,像我這樣的農民工很難理解。 | |
| | 外部效能感 (EE) | 政府能夠公開徵求農民工意見。 | |
| | | 政府能夠及時回應農民工訴求。 | |
| | | 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能夠發揮網絡輿論作用,影響政府行為與決策。 | |
| 制度化 網絡政治參與 (PP) Cronbach's α =.85 | 參與行為 (PB) | 我會在政務短視頻評論區發表關於政治熱點的評論。 | 于晶、謝澤杭, 2020;黃少華等, 2016 |
| | | 我會轉發涉及政治熱點的政務短視頻。 | |
| | | 我會積極參加政務短視頻發起的與政治有關的討論與投票。 | |
| | | 我會利用政務短視頻私信等功能進行網絡維權。 | |
| | | 我會主動發布政治熱點的短視頻並@政務短視頻。 | |

根據上述德爾菲法,本研究構建如圖四所示的「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影響模型」。其中,政治認同包含「體制認同」、「政黨認同」、「身分認同」、「文化認同」、「政策認同」、「發展認同」六個測度項;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包括「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兩個測度項;政治效能感涵蓋「內部效能感」、「外部效能感」兩個測度項;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在本研究中通過「參與行為」進行測度。在德爾菲法中,專家認為測度項均能較好反映變量情況。如前文所述,相比於政務微博、微信,政務短視頻更受新生代農民工歡迎,是新生代農民工目前最重要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渠道。所以,對政務短視頻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測量,能夠較好反映當下新生代農民工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

圖四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影響模型



數據採集

研究者曾於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在滬農民工中開展長達一年的民族誌研究(于晶、謝澤杭, 2021)。基於前期農民工研究基礎, 本研究從熟識的新生代農民工入手, 採用滾雪球方式線上發放、收集問卷。具體路徑為: (1) 直接通過微信向熟識的新生代農民工發放問卷; (2) 由熟識的新生代農民工幫忙, 將問卷轉發至朋友圈和其所在的農民工微信群; (3) 在農民工幫助下滾雪球式多人多次轉發。

問卷首先對本研究的新生代農民工範圍做出說明, 並對政務短視頻進行解釋, 設置問項「我是/否訂閱過政務短視頻」, 填寫「是」的、符合新生代農民工界定的方可填寫問卷, 從而確保新生代農民工樣本為政務短視頻使用者。調查時間為2021年6月5日至2021年7月20日, 共收回問卷659份, 剔除填答時過短等無效問卷47份, 本研究收集到有效問卷612份, 樣本基本信息如表二所示。樣本情況與國家統計局(2021)發布的《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大致相符, 同時發現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呈現出受教育程度以高中或中專為主, 總體上高於傳統農民工群體、中共黨員比例較高等新特點。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8期(2024)

表二 樣本基本信息匯總表¹

| 基本信息 | 題項 | 樣本數 | 所佔百分比 |
|-----------------|--------|-----|--------|
| 性別 | 男 | 335 | 54.74% |
| | 女 | 277 | 45.26% |
| 年齡 ² | < 18歲 | 29 | 4.74% |
| | 18-25歲 | 193 | 31.54% |
| | 26-35歲 | 251 | 41.01% |
| | 36-41歲 | 139 | 22.71% |
| 民族 | 漢族 | 580 | 94.77% |
| | 少數民族 | 32 | 5.23% |
| 政治面貌 | 中共黨員 | 38 | 6.21% |
| | 非中共黨員 | 574 | 93.79% |
| 受教育程度 | 小學及以下 | 69 | 11.27% |
| | 初中 | 185 | 30.23% |
| | 高中或中專 | 321 | 52.45% |
| | 大專和本科 | 37 | 6.05% |
| 職業類型 | 工業 | 295 | 48.20% |
| | 服務業 | 317 | 51.80% |

驗證性因子分析

為進一步驗證具體題項對測度項、測度項對變量的反映程度，本研究在AMOS 25.0中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

在結構效度方面，測量模型呈現出良好的適配度：就絕對適配度指標而言， $CMIN/DF = 1.50$ ($p < .001$)、 $AGFI = .96$ 、 $SRMR = .04$ 、 $RMSEA = .03$ ， $CMIN/DF$ (minimum discrepancy function by degrees of freedom divided) 理想值應小於3， $AGFI$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一般在.90至1.00之間屬良好 (Hair et al., 2009)， $SRMR$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理想值應小於.08， $RMSEA$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理想值應小於.06 (Hu & Bentler, 1999)，以上數值在本研究中均呈現良好。就增值適配度指標而言， $NFI = .95$ 、 $RFI = .94$ 、 $IFI = .96$ 、 $TLI = .95$ ， NFI (normed fit index)、 RFI (relative fit index)、 IFI (incremental fit index)、 TLI (Tucker-Lewis index) 這些指標的值越接近1越好，一般來說，如果這些指標的值大於.90，就可以認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

為模型的擬合度是良好的 (Kline, 2011)，本研究中這些指標的值均大於 .90，屬良好。就簡約適配度指標而言，AI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ECVI (expected cross-validation index) 值相對其他模型比較時，比獨立模型和飽和模型對應值小的模型更優 (Bollen, 1989)。本研究中，AIC、BIC、ECVI 均小於獨立模型和飽和模型的對應值，所以是良好的。

在聚斂效度方面。如表三所示，首先，測度項與變量之間的因子負載在 .69 至 .93 之間，具體題項與測度項的因子負載在 .68 至 .90 之間，均大於 .50，處於十分理想的水準 (侯傑泰等，2021)。其次，各潛變量的平均提取方差值 (AVE) 均大於 .50，組合信度 (CR) 均大於 .70，說明聚斂效度理想 (侯傑泰等，2021)。

表三 各潛變量的標準化因子負載、平均提取方差值 AVE 及組合信度 CR 表

| 變量 | 測度項 (潛變量) | 標準化因子負載 | 題項 | 標準化因子負載 | AVE | CR | |
|-----------|-----------|---------|-----|---------|-----|-----|-----|
| 政治認同 | 體制認同 (IN) | .93 | IN1 | .73 | .56 | .79 | |
| | | | IN2 | .69 | | | |
| | | | IN3 | .81 | | | |
| | 政黨認同 (PP) | .81 | | PP1 | .83 | .63 | .87 |
| | | | | PP2 | .76 | | |
| | | | | PP3 | .81 | | |
| | | | | PP4 | .78 | | |
| | 身分認同 (ID) | .69 | | ID1 | .68 | .58 | .80 |
| | | | | ID2 | .82 | | |
| | | | | ID3 | .77 | | |
| | 文化認同 (CU) | .75 | | CU1 | .76 | .66 | .86 |
| | | | | CU2 | .81 | | |
| CU3 | | | | .87 | | | |
| 政策認同 (PO) | .90 | | PO1 | .88 | .65 | .85 | |
| | | | PO2 | .79 | | | |
| | | | PO3 | .75 | | | |
| 發展認同 (DE) | .87 | | DE1 | .75 | .59 | .81 | |
| | | | DE2 | .76 | | | |
| | | | DE3 | .80 | | | |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8期(2024)

| 變量 | 測度項(潛變量) | 標準化因子負載 | 題項 | 標準化因子負載 | AVE | CR | | |
|----------------|-----------|---------|-----|---------|-----|-----|-----|-----|
| 政務短視頻 感知有用性 | 個人利益(PE) | .84 | PE1 | .78 | .69 | .87 | | |
| | | | PE2 | .83 | | | | |
| | | | PE3 | .88 | | | | |
| | 集體利益(GR) | .89 | GR1 | .90 | | | | |
| | | | GR2 | .86 | | | | |
| | | | IE1 | .76 | | | | |
| 政治效能感 | 內部效能感(IE) | .88 | IE2 | .78 | .56 | .79 | | |
| | | | IE3 | .70 | | | | |
| | | | EE1 | .86 | | | | |
| | 外部效能感(EE) | .91 | EE2 | .80 | | | .70 | .88 |
| | | | EE3 | .85 | | | | |
| | | | PB1 | .87 | | | | |
| 制度化網絡 政治參與 | 參與行為(PB) | .90 | PB2 | .75 | .67 | .91 | | |
| | | | PB3 | .77 | | | | |
| | | | PB4 | .80 | | | | |
| | | | PB5 | .90 | | | | |
| | | | | | | | | |

表四 AVE的平方根與潛變量間的相關係數

| | IN | PP | ID | CU | PO | DE | PE | GR | IE | EE | PB |
|----|-------|-------|-------|-------|-------|-------|-------|-------|-------|-------|-----|
| IN | .75 | | | | | | | | | | |
| PP | .41** | .80 | | | | | | | | | |
| ID | .37** | .40** | .76 | | | | | | | | |
| CU | .37** | .31** | .40** | .82 | | | | | | | |
| PO | .50** | .48** | .45** | .39** | .85 | | | | | | |
| DE | .44** | .40** | .43** | .37** | .37** | .77 | | | | | |
| PE | .41** | .50** | .48** | .36** | .38** | .40** | .83 | | | | |
| GR | .29** | .31** | .27** | .39** | .30** | .33** | .40** | .88 | | | |
| IE | .10** | .17** | .19** | .12** | .12** | .17** | .10** | .12** | .75 | | |
| EE | .12** | .16** | .19** | .13** | .15** | .11** | .17** | .19** | .46** | .84 | |
| PB | .25** | .30** | .29** | .27** | .28** | .27** | .21** | .20** | .10** | .13** | .82 |

註：** $p < .01$ ，對角線數值代表各測度項(潛變量)的平均提取方差值AVE的平方根，兩兩測度項(潛變量)間的數值表示其相關係數。IN：體制認同；PP：政黨認同；ID：身分認同；CU：文化認同；PO：政策認同；DE：發展認同；PE：個人利益；GR：集體利益；IE：內部效能感；EE：外部效能感；PB：參與行為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

區分效度是測量不同變量的測度項之間所具有的差異性程度，可以通過比較AVE的平方根與變量間的相關係數進行檢驗，當變量AVE值的平方根大於該變量與其他變量的相關係數時，區分效度較高 (Chin, 1998)。如表四所示，各變量AVE值的平方根均明顯大於該變量與其他變量的相關係數，測量模型的區分效度較高。

研究結果

描述統計分析呈現四個核心變量兩兩之間的相關關係，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則重點考察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的中介作用及感知效能感的調節作用。

描述統計分析

本研究對政治認同、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政治效能感和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四個核心變量進行基本的描述統計分析及相關性分析，結果如表五所示。兩兩變量間均呈顯著正向相關，這為檢驗研究假設提供了基礎。

表五 核心變量的描述統計及相關分析結果

| | 平均數 | 標準誤差 | PI | PU | PE | PP |
|--------------------|------|------|--------|-------|------|------|
| 政治認同 (PI) | 3.85 | .64 | 1.00 | | | |
| 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 (PU) | 3.74 | .75 | .49*** | 1.00 | | |
| 政治效能感 (PE) | 3.01 | .69 | .20** | .10** | 1.00 | |
| 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 (PP) | 3.63 | .70 | .27*** | .21** | .12* | 1.00 |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下同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

本研究採用Hayes研發的SPSS PROCOESS插件(Model 15)進行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在控制性別、年齡、民族、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職業類型等人口統計學變量的條件下，本研究檢驗了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在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影響的中介作用，以及新生代農民工政治效能感在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直接影響中的調節作用，和新生代農民工政治效能感在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和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關係中的調節作用。

迴歸分析結果如表六所示，政治認同可以顯著正向影響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beta = .40, p < .01, CI = [.33, .46]$)，亦可以顯著正向影響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beta = .63, p < .001, CI = [.30, .70]$)。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與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顯著正向相關($\beta = .41, p < .001, CI = [.35, .71]$)。同時，政治效能感與政治認同的交互項與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顯著正向相關($\beta = .24, p < .05, CI = [.20, .32]$)，政治效能感與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的交互項與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顯著正向相關($\beta = .25, p < .01, CI = [.17, .52]$)，說明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以及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均受到了政治效能感的調節。

在Model 3中，交互項係數在統計學上顯著，變量政治認同和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的係數均非單純數值，而是對政治效能感的線性方程(李武等，2020)。因此，脫離調節變量直接討論政治認同及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意義不大。本研究採用Bootstrapping方法分析政治效能感的調節作用(Hayes & Rockwood, 2017)，將政治效能感均值分別加減一個標準誤差，得到低政治效能感($M-1SD$)和高政治效能感($M+1SD$)兩組，進行五千次有放回的重複抽樣，在95%的Bootstrap置信區間內，檢驗不同政治效能感下，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直接效應的顯著性，以及政治認同經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中介效應顯著性，並進行簡單斜率檢驗。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

表六 迴歸分析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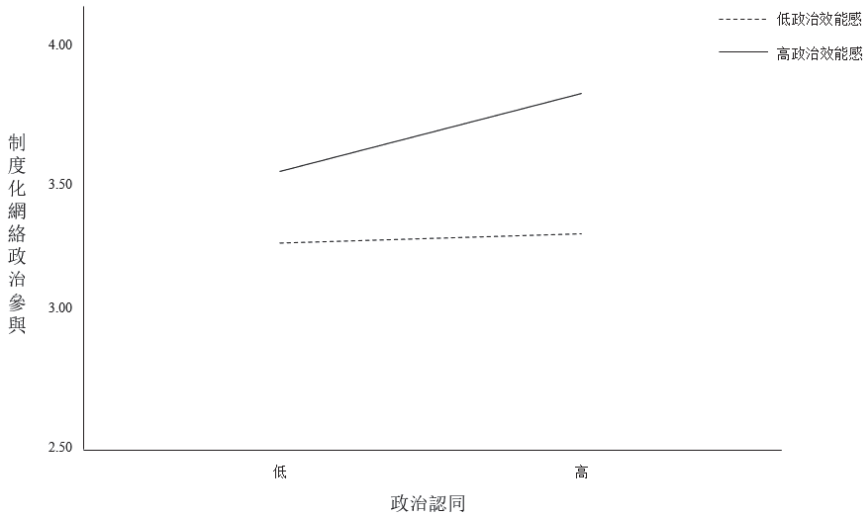
| 因變量 | Model 1 | | | | Model 2 | | | | Model 3 | | | |
|--------------------|------------|----------|------|------|-------------|----------|------|------|-------------|----------|------|------|
| | 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 | | | | 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 1 | | | | 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 2 | | | |
| | β | <i>p</i> | LLCI | ULCI | β | <i>p</i> | LLCI | ULCI | β | <i>p</i> | LLCI | ULCI |
| 控制變量 | | | | | | | | | | | | |
| 性別 | .01 | .38 | -.07 | .11 | .07 | .22 | -.04 | .13 | .07 | .21 | -.03 | .13 |
| 年齡 | -.02 | .17 | -.06 | .02 | -.02 | .16 | -.03 | .04 | -.02 | .15 | -.03 | .05 |
| 民族 | .01 | .10 | -.08 | .02 | .05 | .17 | -.02 | .06 | .05 | .18 | -.03 | .06 |
| 政治面貌 | .05 | .01 | .04 | .06 | .05 | .00 | .04 | .06 | .05 | .00 | .04 | .08 |
| 受教育程度 | -.04 | .23 | -.07 | .03 | -.02 | .19 | -.04 | .02 | -.02 | .19 | -.04 | .02 |
| 職業類型 | -.01 | .12 | -.03 | .02 | -.04 | .18 | -.05 | .02 | -.03 | .17 | -.05 | .02 |
| 自變量 | | | | | | | | | | | | |
| 政治認同 | .40 | .00 | .33 | .46 | .63 | .00 | .30 | .70 | .60 | .02 | .28 | .66 |
| 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 | | | | | | | | | .41 | .00 | .35 | .71 |
| 政治效能感 | | | | | | | | | .18 | .04 | .13 | .42 |
| 政治認同 × 政治效能感 | | | | | | | | | .24 | .02 | .20 | .32 |
| 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 × 政治效能感 | | | | | | | | | .25 | .01 | .17 | .52 |
| 常數 | 2.62 | .00 | 1.30 | 2.83 | 1.89 | .00 | 1.05 | 1.98 | 2.03 | .00 | 1.08 | 2.09 |
| 整體擬合指數 | | | | | | | | | | | | |
| R^2 | .31 | | | | .12 | | | | .22 | | | |
| <i>F</i> | 17.83*** | | | | 5.57*** | | | | 9.99*** | | | |

註： β 表示標準化係數。① 1 = 女性，2 = 男性；② 1 = < 18歲，2 = 18–25歲，3 = 25–35歲，4 = 35–41歲；③ 1 = 少數民族，2 = 漢族；④ 1 = 非中共黨員，2 = 中共黨員；⑤ 1 = 小學及以下，2 = 初中，3 = 高中或中專，4 = 大專或本科；⑥ 1 = 工業，2 = 服務業。以①–⑥形式表示的數字，代表對控制變量進行解釋的順序。普通數字代表在進行迴歸時，為每個類別變量所賦的值，如：女性被賦值為1、男性被賦值2。下文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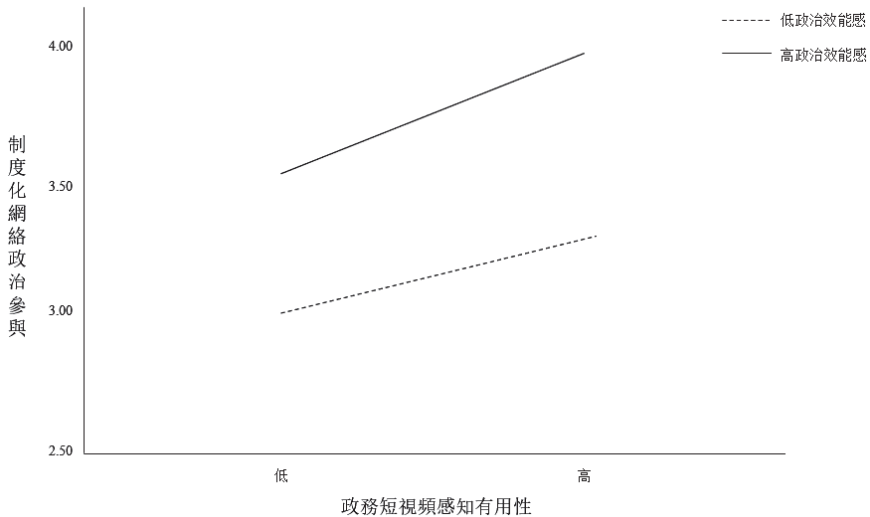
表七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 政治效能感 | 直接效應 | | | | 中介效應 | | | |
|-----------------------------|--------|-----------|------|------|--------|----------------|------|------|
| | Effect | <i>SE</i> | LLCI | ULCI | Effect | Boot <i>SE</i> | LLCI | ULCI |
| 低 (<i>M</i> -1 <i>SD</i>) | .02 | .06 | -.14 | .10 | .18 | .05 | .09 | .20 |
| 高 (<i>M</i> +1 <i>SD</i>) | .18 | .05 | .03 | .19 | .23 | .03 | .12 | .35 |

圖五 政治效能感對政治認同與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關係的調節作用示意圖



圖六 政治效能感對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與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關係的調節作用示意圖



檢驗結果如表七、圖五和圖六所示。在直接效應中，低政治效能感 (CI = [-.14, .10]) 在 95% 置信區間內包含 0，高政治效能感 (CI = [.03, .19]) 則不包含 0，且效應為正。在中介效應下，低政治效能感 (CI = [.09, .20]) 和高政治效能感 (CI = [.12, .35]) 在 95% 置信區間內均不含 0，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

且效應均為正。質言之，低政治效能感的新生代農民工只有在經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的中介作用下，政治認同才會正向影響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而高政治效能感的新生代農民工無論是否經由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的中介效應，其政治認同都可以正向影響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但經中介作用後，這種正向影響更為明顯(.18 → .23)。可見，政治效能感作為調節變量，對於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重大，而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的中介效應也值得被討論，尤其是二者共同發揮正向影響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作用機制：政務短視頻本身就是政府信息發布與回應的渠道，亦是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平台，對於新生代農民工來說，政務短視頻內容的有趣性與有用性使其願意更多地選擇、接受政務短視頻和進行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這一過程本身就可以提升政治效能感，而高的政治效能感又能正向影響政治參與，這一互動過程呈現出多變量間的螺旋式強化作用。

穩健性檢驗

本研究採用增加變量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許多研究指出，新生代農民工所處的互聯網環境和線下環境對其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行為有一定負向影響，具體包括網絡輿情生態影響(張愛軍、曹騰飛，2021)、橋接與黏連社會資本影響(黃少華，2018)、村社影響(鄭建君、馬璇，2021)。將上述研究所涉及的「輿情生態」、「他人影響」、「村社影響」這三類「外部環境」作為新變量加入迴歸分析中，以控制外部環境對新生代農民工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代表性題項如：(1) 輿情生態：「我常常關注網上的輿情動態」；(2) 他人影響：「我在使用社交媒體時會在乎他人的線上評論」；(3) 村社影響：「我會在乎所生活的社區/村莊的普遍觀點」。上述題項採用李克特五級量表測量，從1至5表示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這三類因素經探索性因數分析發現可聚為一類，命名為「外部環境」，量表具有較高信度($\alpha = .81$)，經檢驗亦具有較高的結構效度、聚斂效度和區分效度。最終迴歸結果如表八所示。該結果與表六迴歸分析結果沒有顯著差異，且交互項係數保持顯著，證明本研究理論模型是穩健的。

表八 增加變量後的迴歸分析結果

| 因變量 | Model 1 | | | | Model 2 | | | | Model 3 | | | |
|--------------------|------------|----------|------|------|------------|----------|------|------|------------|----------|------|------|
| | 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 | | | | 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1 | | | | 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2 | | | |
| | β | <i>p</i> | LLCI | ULCI | β | <i>p</i> | LLCI | ULCI | β | <i>p</i> | LLCI | ULCI |
| 控制變量 | | | | | | | | | | | | |
| 性別 | .01 | .40 | -.07 | .11 | .08 | .23 | -.04 | .13 | .06 | .21 | -.04 | .13 |
| 年齡 | -.03 | .17 | -.06 | .03 | -.01 | .17 | -.03 | .04 | -.01 | .16 | -.04 | .05 |
| 民族 | .91 | .09 | -.08 | .02 | .05 | .17 | -.03 | .06 | .05 | .18 | -.03 | .06 |
| 政治面貌 | .06 | .01 | .04 | .07 | .05 | .00 | .04 | .06 | .06 | .00 | .03 | .08 |
| 受教育程度 | -.05 | .23 | -.07 | .03 | -.03 | .19 | -.05 | .03 | -.03 | .20 | -.04 | .02 |
| 職業類型 | -.03 | .12 | -.04 | .02 | -.03 | .18 | -.05 | .02 | -.01 | .19 | -.05 | .02 |
| 自變量 | | | | | | | | | | | | |
| 外部環境 | -.20 | .00 | -.36 | -.19 | -.24 | .00 | -.31 | -.20 | -.22 | .00 | -.39 | -.20 |
| 政治認同 | .40 | .00 | .32 | .44 | .62 | .00 | .29 | .68 | .55 | .03 | .29 | .67 |
| 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 | | | | | | | | | .39 | .00 | .34 | .71 |
| 政治效能感 | | | | | | | | | .20 | .04 | .13 | .41 |
| 政治認同 × 政治效能感 | | | | | | | | | .25 | .03 | .21 | .33 |
| 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 × 政治效能感 | | | | | | | | | .21 | .01 | .18 | .50 |
| 常數 | 2.69 | .00 | 1.30 | 2.95 | 1.88 | .00 | 1.05 | 1.98 | 1.97 | .00 | 1.12 | 2.14 |
| 整體擬合指數 | | | | | | | | | | | | |
| R^2 | .31 | | | | .13 | | | | .23 | | | |
| <i>F</i> | 17.11*** | | | | 5.67*** | | | | 9.82*** | | | |

註： β 表示標準化係數。①1 = 女性，2 = 男性；②1 = < 18歲，2 = 18–25歲，3 = 26–35歲，4 = 36–41歲；③1 = 少數民族，2 = 漢族；④1 = 非中共黨員，2 = 中共黨員；⑤1 = 小學及以下，2 = 初中，3 = 高中或中專，4 = 大專和本科；⑥1 = 工業，2 = 服務業

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聚焦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群體，基於對其政務短視頻使用的考察，構建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模型，探求媒介使用在政治心理、政治行為中的作用。本研究在理論層面上，為政治認同與制度化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提供了來自互聯網情境下的證據，豐富了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心理和政治參與行為研究，為媒介效果研究提供實證支持，並進一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

步延展了強化螺旋模型在政治傳播領域的應用；在實踐層面上，有利於為更好調動新生代農民工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積極性提供參考。

研究發現高政治效能感的新生代農民工，其政治認同在直接效應和中介效應下均可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產生正向影響，且中介效應的影響程度大於直接效應。對低政治效能感的新生代農民工而言，政治認同必須在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這一中介作用下方可正向影響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我們可將這一研究結果放在當前中國的制度邏輯下探討，以期為推動積極的政治參與行為提供路徑。

新渠道下的技術賦權邏輯優化

對於科技與民主的關係，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 (1999 : 92) 曾論述道：「我們提出的問題是技術和民主關係的問題，即如何把人們所掌握的技術力量，反過來使用於從事生產的和進行交談的公民的共識」。在技術賦權的支持下，數字協商民主實踐的場域得以延展，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生活不再是被動接受的消極樣態，而是通過社交平台積極自我選擇符合個體與集體利益的信息，並主動投身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中。對此，有學者認為技術進步推動了民主化進程，賦予普通公民更多的制度化政治參與機會 (原新利，2019)。但也有學者擔心，這種技術賦權只是協商結構變遷下的「精英民主」，信息富有者可借助算法輕易獲取更多信息，提高制度化政治參與意識與民主協商能力，而弱勢群體可能會在資本邏輯主導下的商業化信息中迷失自我，喪失信息批判能力與協商能力 (趙愛霞、王岩，2020)。

回到對研究結果的探討，本研究提出以下設想：政務短視頻是公權力對技術賦權邏輯的優化，即由政黨作背書，為新生代農民工構築穩定安全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平台。這一方面有利於消解資本邏輯下算法機制對新生代農民工的「信息繭房」等不良影響，儘可能實現更廣泛的制度化政治參與，另一方面有助於維護穩定的輿論生態，防止短視頻算法邏輯下產生的「群體極化」現象。具體到研究結果，高政治效能感的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有一定參與政治生活的信心和對現存政治系統的較高評價，對於這一部分群體來說，政務短視頻的作用在於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8期(2024)

維繫並強化其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為他們提供暢通的制度化政治參與渠道，引導其有序表達意見、反映問題，既解決個體矛盾，又為國家治理提供更多元的思路借鑒。對於低政治效能感的新生代農民工而言，缺少有效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路徑，很可能使其利用線下非常規手段進行意見表達。短視頻作為農民工休閒的重要方式，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通過中介效應影響其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使低效能感新生代農民工在政務短視頻影響下，合法有序通過評論區、直播間等形式表達觀點，使其從「表達無門」走向「反饋有道」，從而通過新媒體渠道實現更廣泛的參與，並將國家可能存在的不穩定因素最大限度轉化至可控。

強化螺旋模型下的新生代農民工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

首先，無論高或低政治效能感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認同在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的中介下，都與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之間存在著緊密的正向關係。他們的政治認同感促使他們積極使用網絡平台參與政治活動，而網絡平台又提供了他們表達政治認同、獲取政策信息的重要途徑，並根據強化螺旋模型的假設，進而強化其認同的信念態度，形成正向循環。這也意味著，進一步提高高政治效能感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認同感，強化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對於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具有重要的意義。

其次，強化螺旋模型的基本假設是，媒介使用與個體的態度、行為為相互作用，選擇性的媒介接觸和媒介接觸的效果構成了一個動態持續的過程，但近年來的實證研究並非均支持該理論模型。首先，關於政治效能感對媒介使用的影響。鍾智錦、廖小歐(2022)新進的研究發現，對政治效能具有更積極態度的個體，更有可能去主動接觸公共信息，而那些原本就對政治效能持消極態度的個體則更容易迴避，從而不斷擴大公共信息接觸的鴻溝，社交媒體更多扮演著信息獲取工具的角色，而非激發態度轉變的角色。其次，媒介使用與參與行為的相互作用。Boulianne(2015)一項有關社交媒體使用與公眾參與的元分析發現，儘管80%的研究發現了社交媒體使用與公眾參與之間的正向關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

係，但只有一半研究的係數是顯著的，追蹤研究報告的顯著係數更少(26%)。

上述研究結果，是否說明強化螺旋模型在當下已經不再適用？雖然橫截面研究無法確定因果關係，但本研究為強化螺旋模型提供了一定實證支撐。研究結果顯示，無論高或低政治效能感的新生代農民工，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均存在顯著的中介效應。政務短視頻內容的有趣性與有用性使新生代農民工願意更多地選擇、接受政務短視頻並進行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更為積極的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能夠提升新生代農民工政治效能感，並且強化其對政務短視頻的有用性認知，進一步形成螺旋式的媒介使用與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強化過程。當然，要確定因果關係，將需要進一步的追蹤研究或實驗研究。

本研究對強化螺旋模型驗證的解釋，可以回到政務短視頻這一媒介的特殊性，從而以小見大，剖析強化螺旋模型的適用範圍。一方面，政務短視頻一大優勢便是圖聲文的多維度融合，進一步調動受眾感官體驗。政治效能感作為調節變量對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在中介變量「政務短視頻感知有用性」的作用下會產生更為正向的結果。從政務新媒體內容生產主體來思考，「感知有用性」的達成需要短視頻作品在內容維度上的支持，其最核心的部分在於滿足公眾個體和集體兩方面的利益需求。基於此，不僅是高政治效能感的群體能夠更好利用政務短視頻，低政治效能感的群體亦可以被吸引，從而奠定政務短視頻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受眾基礎。另一方面，社交媒體平台的互動性增加了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技術便利，在互動的同時又可以提升參與者的政治效能感，特別是在雙向互動暢通的情況下，好的內容生產吸引更多的受眾關注並參與互動，政府方及時回應，引發更高品質的溝通過程，形成良性循環，雙向促進。政務短視頻自身所提供的評論、轉發、私信等互動功能，大大降低了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難度，參與政治生活的門檻大大降低，這為媒介使用與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相關關係注入了強大力量。綜上所述，強化螺旋模型很大程度上受到媒介本身屬性的影響，內容信息本身滿足公眾利益需求的程度、媒介的互動機制難易程度，都會對強化螺旋模型的有效性產生影響。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8期(2024)

本研究還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問卷採用滾雪球方式進行，並非隨機抽樣，這可能導致樣本代表性存在局限。二是研究僅選取政務短視頻進行分析，研究結論是否適用於政務微博、政務微信等其他政務新媒體仍有待進一步檢驗。三是政務短視頻目前出現了以直播間形式開展的網絡問政，但由於這種模式仍處於探索階段，運用不夠廣泛，研究樣本基本沒有參與，故研究未將其納入考察，今後該模式是否具有持續性，是否能成為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重要衡量指標，仍需持續關注。

註釋

1. 問卷具體題項包含相應解釋，如在「職業類型」題項後附上對工業和服務業的解釋：「工業(建築行業；輕紡工業：食品、飲料、煙草加工、服裝、紡織、皮革、木材加工、傢俱、印刷等；資源加工工業：石油化工、化學纖維、醫藥製造業、橡膠、塑膠、黑色金屬等；機械、電子製造業：機床、專用設備、交通運輸工具、機械設備、電子通訊設備、儀器等……)。服務業(住宿業、餐飲業……)」。問卷的解釋亦參考了《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因篇幅有限，不一一列舉。本研究的服務業主要指餐廳服務員、保潔員等低端服務業。
2. 為保證樣本資訊匯總後有各類人群所佔比例等可參照的依據，研究對年齡的賦值參考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其以25歲及以下為第一個分類，之後每十年為一個年齡分類。由於本研究聚焦新生代農民工，具有特殊性，故將未成年農民工單獨分為一類。此外，根據前文國務院關於新生代農民工年齡的劃分標準「1980年及之後出生」，本研究發放問卷時年齡最大的新生代農民工為41歲，故最後一類截至41歲。表中對民族、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和職業類型等分類亦有參考《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于晶、謝澤杭(2020)。〈政務短視頻傳播效果評價指標體系構建〉。《華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頁117-127。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

- Yu Jing, Xie Zehang (2020). Zhengwu duanshipin chuanbo xiaoguo pingjia zhibiao tixi goujian. *Huanan ligong daxue xuebao (Shehuikexue ban)*, 6, 117–127.
- 于晶、謝澤杭 (2021)。〈故鄉何處是：短視頻平台上的農民工社群建構與鄉土記憶——對抖音「福建村」的考察〉。《新聞界》，第9期，頁44–57。
- Yu Jing, Xie Zehang (2021). Guxiang hechushi: Duanshipin pingtai shang de nongmingong shequn jiangou yu xiangtu jiyi—Dui Douyin “Fujian cun” de kaocha. *Xinwenjie*, 9, 44–57.
-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 (2009)。《中國大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Zhongguo dabaiké quanshu zongbianji weiyuanhui (2009). *Zhongguo dabaiké quanshu*. Beijing: Zhongguo da baike quanshu chubanshe.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200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 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取自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0/content_1528900.htm。
-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zhongyang renmin zhengfu (2009, December 31). *Zhonggong zhongyang Guowuyuan guanyu jiada tongchou chengxiang fazhan lidu jinyibu hangshi nongye nongcun fazhan jichu de ruogan yiji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0/content_1528900.htm.
- 尤爾根·哈貝馬斯 (1999)。《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和科學》(李黎、郭官義譯)。上海：學林出版社。(原書Habermas, J. [1968].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Suhrkamp Verlag.)
- Youergen Habeimasi (1999). *Zuwei “yishixingtai” de jishu he kexue* (Li Li & Guo Guanyi Trans). Shanghai: Xuel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Habermas, J. [1968].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Suhrkamp Verlag.)
- 王明生、馬維振 (2020)。〈公民網絡政治參與法律規制面臨的困境與出路〉。《江蘇行政學院學報》，第3期，頁83–89。
- Wang Mingsheng, Ma Weizhen (2020). Gongmin wangluo zhengzhi canyu falü guizhi mianlin de kunjing yu chulu. *Jiangsu xingzheng xueyuan xuebao*, 3, 83–89.
- 王衡、季程遠 (2017)。〈互聯網、政治態度與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基於1953名網民樣本的實證分析〉。《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第4期，頁45–55。
- Wang Heng, Ji Chengyuan (2017). Hulianwang, zhengzhi taidu yu feizhiduhua zhengzhi canyu—Jiyu 1953 ming wangmin yangben de shizheng fenxi. *Jingji shehui tizhi bijiao*, 4, 45–55.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8期(2024)

史為民、郭巍青、鄭建君、涂鋒、陳曉運(2012)。《中國公民的政策參與——2011年北京、廣東大學生問卷調查資料報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Shi Weimin, Guo Weiqing, Zheng Jianjun, Tu Feng, Chen Xiaoyun (2012). *Zhongguo gongmin de zhengce canyu—2011 nian Beijing, Guangdong daxuesheng wenjuan diaocha ziliao baogao*. Beijing: Zhongguo Shehuikexue chubanshe.

李占樂、魏楠(2020)。〈中國公民網絡政治參與影響因素實證研究的量化整合——基於文獻的權重分析和元分析〉。《公共管理評論》，第2期，頁65–80。

Li Zhanle, Wei Nan (2020). *Zhongguo gongmin wangluo zhengzhi canyu yingxiang yinsu shizheng yanjiu de lianghua zhenghe—Jiyu wenxian de quanzhong fenxi he yuanfenxi*. *Gonggong guanli pinglun*, 2, 65–80.

李武、艾鵬亞、曹旭誠(2020)。〈神經質人格與知識付費意願：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圖書與情報》，第4期，頁28–35。

Li Wu, Ai Pengya, Cao Xucheng (2020). *Shenjingzhi renge yu zhishi fufei yiyuan: You tiaojie de zhongjie xiaoying fenxi*. *Tushu yu qingbao*, 4, 28–35.

李強(2019)。《當代中國社會分層》。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Li Qiang (2019). *Dangdai Zhongguo shehui fenceng*. Beijing: 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 shudian.

李奮生、閆志軍、楊娜娜、顏永傑(2016)。〈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研究〉。《農業經濟》，第10期，頁60–62。

Li Fensheng, Yan Zhijun, Yang Nana, Yan Yongjie (2016). *Xinshengdai nongmingong zhengzhi rentong yanjiu*. *Nongye jingji*, 10, 60–62.

房寧、楊海蛟、史為民、周慶智(2013)。《政治參與藍皮書：中國政治參與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Fang Ning, Yang Haijiao, Shi Weimin, Zhou Qingzhi (2013). *Zhengzhi canyu lanpishu: Zhongguo zhengzhi canyu baogao*. Beijing: Shehuikexue wenxian chubanshe.

侯傑泰、溫忠麟、成子娟(2021)。《結構方程模型及其應用》。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Hou Jietai, Wen Zhonglin, Cheng Zijuan (2021). *Jiegou fangcheng moxing jiqi yingyong*. Beijing: Jiaoyu kexue chubanshe.

原新利(2019)。〈自媒體「技術賦權」背景下公民參與權的特點及法律保障〉。《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頁153–160。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

- Yuan Xinli (2019). Zimeiti “jishu fuquan” beijing xia gongmin canyu quan de tedian ji falü baozhang. *Jishou daxue xuebao (Shehuikexue ban)*, 4, 153–160.
- 徐家林、張茜 (2020)。〈民眾政治認同的生成前提與國家構建〉。《江蘇行政學院學報》，第6期，頁67–74。
- Xu Jialin, Zhang Qian (2020). Minzhong zhengzhi rentong de shengcheng qiantu yu guojia goujian. *Jiangsu xingzheng xueyuan xuebao*, 6, 67–74.
- 桑玉成、梁海森 (2017)。〈政治認同是如何形成的？〉。《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頁134–143。
- Sang Yucheng, Liang Haisen (2017). Zhengzhi rentong shi ruhe xingcheng de? *Fudan xuebao (Shehuikexue ban)*, 4, 134–143.
- 袁瀟 (2019)。《數字邊際人——新生代農民工的手機使用和社會認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Yuan Xiao (2019). *Shuzi bianji ren—Xinshengdai nongmingong de shouji shiyong he shehui rentong*. Beijing: Shehui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馬亮 (2019)。〈政務短視頻的現狀、挑戰與前景〉。《電子政務》，第7期，頁2–10。
- Ma Liang (2019). Zhengwu duanshipin de xianzhuang, tiaozhan yu qianjing. *Dianzi zhengwu*, 7, 2–10.
- 高永久、楊龍文 (2022)。〈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邊境牧區政治穩定的關係研究——基於政治認同的視角〉。《東疆學刊》，第2期，頁11–18、127。
- Gao Yongjiu, Yang Longwen (2022). Zhulao Zhonghua minzu gongtongti yishi yu bianjing muqu zhengzhi wending de guanxi yanjiu—Jiyu zhengzhi rentong de shijiao. *Dongjiang xuekan*, 2, 11–18, 127.
- 國家統計局 (2021年4月30日)。〈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取自 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1074.html。
- Guojia tongjiju (2021, April 30). *2020 nian nongmingong jiance diaocha baogao*.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1074.html.
- 張明新、黃欣欣 (2022)。〈青少年的社交媒體新聞接觸和網絡政治參與——政治效能感和媒介素養的中介與調節作用〉。《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頁113–121。
- Zhang Mingxin, Huang Xinxin (2022). Qingshaonian de shejiao meiti xinwen jiechu he wangluo zhengzhi canyu—Zhengzhi xiaonenggan he meijie suyang de zhongjie yu diaojie zuoyong. *Huazhong keji daxue xuebao (Shehuikexue ban)*, 1, 113–121.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8期(2024)

張意濃(2020)。《個體工商戶政治認同對政治參與影響研究》。武漢理工大學碩士論文。

Zhang Yinong (2020). *Geti gongshanghu zhengzhi rentong dui zhengzhi canyu yingxiang yanjiu*. Wuhan ligong daxue shuoshi lunwen.

張愛軍、曹騰飛(2021)。〈突發事件中網絡政治次生輿情形成及糾偏研究〉。《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頁1-12。

Zhang Aijun, Cao Tengfei (2021). Tufa shijian zhong wangluo zhengzhi cisheng yuqing xingcheng ji jiupian yanjiu. *Jiangsu daxue xuebao (Shehuikexue ban)*, 5, 1-12.

張濤、楊麗(2019)。〈民族地區大學生網絡政治參與行為影響因素分析——以雲、桂、黔三省區部分高校為例〉。《民族教育研究》，第1期，頁59-68。

Zhang Tao, Yang Li (2019). Minzu diqu daxuesheng wangluo zhengzhi canyu xingwei yingxiang yinsu fenxi—Yi Yun, Gui, Qian sanshengqu bufen gaoxiao weili. *Minzu jiaoyu yanjiu*, 1, 59-68.

黃少華(2018)。〈社會資本對網絡政治參與行為的影響——對天津、長沙、西安、蘭州四城市居民的調查分析〉。《社會學評論》，第2期，頁19-32。

Huang Shaohua (2018). Shehui ziben dui wangluo zhengzhi canyu xingwei de yingxiang—dui Tianjin, Changsha, Xian, Lanzhou sichengshi jumin de diaocha fenxi. *Shehui xue pinglun*, 2, 19-32.

黃少華、姜波、袁夢遙(2016)。〈網絡政治參與行為量表編製〉。《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頁47-54。

Huang Shaohua, Jiang Bo, Yuan Mengyao (2016). Wangluo zhengzhi canyu xingwei liangbiao bianzhi. *Lanzhou daxue xuebao (Shehuikexue ban)*, 6, 47-54.

黃欣欣(2022)。〈社交媒體偶遇式新聞接觸與青少年潛在政治參與：網絡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討論的遠程中介作用〉。《國際新聞界》，第11期，頁120-141。

Huang Xinxin (2022). Shejiao meiti ouyushi xinwen jiechu yu qingshaonian qianzai zhengzhi canyu: Wangluo zhengzhi xiaonenggan he zhengzhi taolun de yuancheng zhongjie zuoyong. *Guoji xinwenjie*, 11, 120-141.

塞繆爾·亨廷頓、瓊·納爾遜(1989)。《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汪曉壽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原書Huntington, S., & Nelson, J. [1976]. *No easy choi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aimouer Hengtingdun, Qiong Naerxun (1989). *Nanyi jueze: Fazhanzhong guojia de zhengzhi canyu* (Wang Xiaoshou et al., Trans.). Beijing: Huaxia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Huntington, S., & Nelson, J. [1976]. *No easy choice: Political*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楊福忠、姚鳳梅 (2012)。〈我國公民網絡政治參與現狀及保障對策〉。《河北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頁27-36。

Yang Fuzhong, Yao Fengmei (2012). Woguo gongmin wangluo zhengzhi canyu xianzhuang ji baozhang duice. *Hebei shifan daxue xuebao (Zhaxue shehuikexue ban)*, 5, 27-36.

詹小美、王仕民 (2013)。〈文化認同視域下的政治認同〉。《中國社會科學》，第9期，頁27-39。

Zhan Xiaomei, Wang Shimin (2013). Wenhua rentong shiyuxia de zhengzhi rentong. *Zhongguo shehuikexue*, 9, 27-39.

寧晶、孟天廣 (2019)。〈成為政治人：政治參與研究的發展與未來走向〉。《國外理論動態》，第11期，頁80-91。

Ning Jing, Meng Tianguang (2019). Chengwei zhengzhi ren: Zhengzhi canyu yanjiu de fazhan yu weilai zouxiang. *Guowai lilun dongtai*, 11, 80-91.

趙愛霞、王岩 (2020)。〈新媒介賦權與數字協商民主實踐〉。《內蒙古社會科學》，第3期，頁50-58。

Zhao Aixia, Wang Yan (2020). Xin meijie fuquan yu shuzi xieshang minzhu shijian. *Neimenggu shehuikexue*, 3, 50-58.

劉娟、張國軍 (2014)。〈少數民族網絡政治參與研究〉。《廣西民族研究》，第6期，頁26-31。

Liu Juan, Zhang Guojun (2014). Shaoshuminzu wangluo zhengzhi canyu yanjiu. *Guangxi minzu yanjiu*, 6, 26-31.

蔣琳、呂佳、郭曉冬 (2016)。〈新生代農民工參與網絡問政的調查與思考〉。《電子政務》，第9期，頁46-54。

Jiang Lin, Lu Jia, Guo Xiaodong (2016). Xinshengdai nongmingong canyu wangluo wenzheng de diaocha yu sikao. *Dianzi zhengwu*, 9, 46-54.

鄭建君 (2019)。〈政治效能感、參與意願對中國公民選舉參與的影響機制——政治信任的調節作用〉。《華中師範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期，頁10-18。

Zheng Jianjun (2019). Zhengzhi xiaonenggan, canyu yiyuan dui Zhongguo gongmin xuanju canyu de yingxiang jizhi—Zhengzhi xinren de tiaojie zuoyong. *Huazhong shifan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kexue ban)*, 4, 10-18.

鄭建君、馬璇 (2021)。〈村社認同如何影響政治信任？——公民參與和個人傳統性的作用〉。《公共行政評論》，第2期，頁135-153、231-232。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8期(2024)

Zheng Jianjun, Ma Xuan (2021). Cunshe rentong ruhe yingxiang zhengzhi xinren?—Gongmin canyu he geren chuantongxing de zuoyong. *Gonggong xingzheng pinglun*, 2, 135–153, 231–232.

謝澤杭、于晶(2020)。〈基於ELM-SEM模型的政務短視頻受眾採納意願研究〉。《未來傳播》，第3期，頁34–47、137。

Xie Zehang, Yu Jing (2020). Jiyu ELM-SEM moxing de zhengwu duanshipin shouzhong caina yiyuan yanjiu. *Weilai chuanbo*, 3, 34–47, 137.

鍾智錦、廖小歐(2022)。〈公共信息接觸、政治效能和公共參與的「良性循環」〉。《新聞大學》，第8期，頁78–91、124。

Zhong Zhijin, Liao Xiaou (2022). Gonggong xinxi jiechu, zhengzhi xiaoneng he gonggong canyu de “liangxing xunhuan”. *Xinwen daxue*, 8, 78–91, 124.

羅伯特·A·達爾、布魯斯·史泰恩布里克納(2012)。《現代政治分析》(吳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Dahl, R. A., & Stinebrickner, B. [2002]. *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 United Kingdom: Prentice Hall.)

Luobote A Daer, Bulusi Shitaienbulikena (2012). *Xiandai zhengzhi fenxi* (Wu Yong, Trans.).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Dahl, R. A., & Stinebrickner, B. [2002]. *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 United Kingdom: Prentice Hall.)

羅瑩、劉冰(2009)。〈網絡信息傳播效果研究〉。《情報科學》，第10期，頁1487–1491。

Luo Ying, Liu Bing (2009). Wangluo xinxi chuanbo xiaoguo yanjiu. *Qingbao kexue*, 10, 1487–1491.

蘭君、張旭(2014)。〈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研究〉。《當代青年研究》，第6期，頁17–21。

Lan Jun, Zhang Xu (2014). Xinchengdai nongmingong zhengzhi rentong yanjiu. *Dangdai qingnian yanjiu*, 6, 17–21.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Barry, A. (2001). *Political machines: Governing a technological society*. Bloomsbury Publishing.

Bollen, K. A. (1989). *Structural equations with latent variables*. John Wiley & Sons.

Bou-Hamad, I., & Yehya, N. A. (2016). Partisan selective exposure in TV consumption patterns: A polarized developing country contex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7(1), 55–81.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

- Boulianne, S. (2015). Social media use and participation: A meta-analysis of current research.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8*(5), 524–538.
- Brundidge, J. (2010). Encountering “difference” in the contemporary public sphere: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nternet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political discussion network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0*(4), 680–700.
- Campbell, A., Gurin, G., & Miller, W. E. (1954). *The voter decides*. Row, Peterson and Company.
- Chan, M., Chen, H.-T., & Lee, F. L. F. (2016). Examining the roles of mobile and social media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three Asian societies using a communication mediation approach. *New Media & Society, 19*(12), 2003–2021.
- Chin, W. W. (1998).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approach to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G. A. Marcoulides (Ed.), *Modern methods for business research* (pp. 295–336).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Davis, F. D., Bagozzi, R. P., & Warshaw, P. R. (1989). User acceptance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 comparison of two theoretical models. *Management Science, 35*(8), 982–1003.
- Fowler, J. H., & Kam, C. D. (2007). Beyond the self: Social identity, altruism,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69*(3), 813–827.
- Gastil, J., & Xenos, M. (2010). Of attitudes and engagement: Clarifying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ivic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0*(2), 318–343.
- Hair, J., Black, W., Babin, B., & Anderson, R. (2009).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7th ed.]. Pearson.
- Hayes, A. F., & Rockwood, N. J. (2017). Regression-based statistical mediation and moderation analysis in clinical research: Observations, recommend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Behavior Research and Therapy, 98*(11), 39–57.
- Hu, L., & Bentler, P. M. (1999). 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6*(1), 1–55.
- Huddy, L. (2003). Group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ohesion. In D. O. Sears, L. Huddy, & R. Jervis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pp. 511–55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im, J., & Hyun, K. D. (2017). Political disagreement and ambivalence in new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Exploring 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s of partisan news use and heterogeneous discussion networks on SNSs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34*(8), 1586–1596.
- Kline, R. B. (2011).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3rd ed.]. Guilford Publications.
- Lane, R. E. (1959). *Political life: Why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The Free Press.

《傳播與社會學刊》· (總) 第 68 期 (2024)

- Nah, S., & Yamamoto, M. (2020). Citizen journalism, political discussion,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Testing a moderating role of media credibility and collective effica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4*(2), 5177–5198.
- Niemi, R. G., Craig S. C., & Mattei, F. (1991). Measuring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in the 1988 national election stud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4), 1407–1413.
- Norris, P. (2001). *Digital divide: Civic engagement,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the Internet worldwi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later, M. D. (2007). Reinforcing spirals: The mutual influence of media selectivity and media effects and their impact on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social identity. *Communication Theory, 17*(3), 281–303.
- Slater, M. D. (2014). Reinforcing spirals model: Conceptual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content exposure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attitudes. *Media Psychology, 18*(3), 370–395.
- Slater, M. D., & Rasinski, K. A. (2005). Media exposure and attention as mediating variables influencing social risk judgmen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5*(4), 810–827.
- Stroud, N. J. (2010). Polarization and partisan selective exposu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0*(3), 556–576.
- Verba, S., Schlozman, K. L. & Brady, H. E. (1995).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einschenk, A. C., Dawes, C. T., Oskarsson, S., Klemmensen, R., & Nørgaard, A. S. (202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monozygotic twins in the United States, Sweden, Germany, and Denmark. *Electoral Studies, 69*, 102269.
- Willnat, L., Wong, W. J., Tamam, E., & Aw, A. (2013). Online media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case of Malaysia.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6*(4), 557–585.

本文引用格式

謝澤杭、于晶 (2024)。〈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對制度化網絡政治參與的影響——基於政務短視頻的有調節中介效應分析〉。《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68 期，頁 45–84。